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思想逻辑

Research on the Thought Logic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金民卿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思想逻辑

Research on the Thought Logic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金民卿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 / 金民卿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201 - 1518 - 6

I. ①马… II. ①金…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发展 - 研
究 - 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4377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

著 者 / 金民卿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王小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编辑部(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1 字 数:334千字

版 次 /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518 - 6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述要	5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史	5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节点	13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经验	50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分析	53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	55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多要素互动的过程性存在	64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自主性的、创造性的结合过程	71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	82
一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张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	83
二 近代中国的现实危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	91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	104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矛盾	122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系统	123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系统	138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主客体互动的开放性过程	146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	151
一 译介和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	153

二 吸收与内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	162
三 融合与再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	174
四 突破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187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维度	195
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	196
二 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	206
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传播	216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机制	230
一 信仰引领机制	232
二 实践动力机制	239
三 思想交锋机制	249
四 集体智慧机制	257
五 思想共识机制	265
六 纠错创新机制	273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形态	285
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286
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道路	299
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体系	310
 主要参考文献	322
后 记	329

引 言

这是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理论的论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年来中国主流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热词，每年在这个领域发表的文章可以说不计其数。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个问题在学术界的急速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个学科本身尚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研究，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重要文献研究，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理论文献，如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不同历史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作家的重要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家的文献研究等。二是历史进程和经验研究，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断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专题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研究，等等。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基础理论研究，如其基本内涵、发生逻辑、内在矛盾、逻辑进程、内容构成、发展机制等基本理论分析。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的重要理论成果研究，如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若干重大理论观点和重要概念等方面的研究。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重点是研究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发展方式、共同富裕、集体经济、文化发展、民主政治、生态文明等。

但是，在当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历史内在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学科从提出之日起,就同中共党史学科密不可分,在当前的理论研究中,二者也确实被“纠缠”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一批学者,也正是从中共党史的视角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这种状况虽然有助于清晰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是也导致了学科界域的模糊。中国共产党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主体而不是全部主体,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还包括领袖主体、理论家主体、群众主体等,中共党史不能够把这些主体全部包括其中;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主体自身发展的历史,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全部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总体性进程,还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他主体的内涵及发展变化,研究它的客体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的发展变化,研究总体性进程的发生、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发展机制等,这是中共党史所难以涵盖的。因此,仅仅从中共党史的视角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不够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等同于中共党史学科也是不准确的。如何在科学把握二者之间合理关系的同时,更好地厘清二者之间的学科界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现实性非常强的研究领域,必须高度关注和科学回答现实实践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往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单纯地看作对策性研究,甚至简单地看作对主流意识形态或者官方话语的注解,对其深层的学术意蕴不加关注乃至悬置不论。这种倾向虽然可以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具体生动性,但也很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肤浅化、庸俗化,最终使其陷入政治婢女的境地,成为始终跟在主流政治话语后边的鹦鹉学舌者,难以建构独立的学科话语体系。或者稍微好一点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单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这固然能够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但是在割裂其整体性的同时,难免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如何在高度注重现实性、时代性、生动性的同时,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深度性和学科独立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注意的又一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学科,从建立到现在,只有十来年的时间,其研究的界域和逻辑尚在形成当中。正因为如此,这个学科研

究领域存在着学科依赖和话语随从的情况，学术话语体系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例如在历史分期上套用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的模式，在基本概念界定上套用了主流政治话语。这种情况虽然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和事实上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学科也就失去自身的学科独立性和存在必要性了。这不仅同设置这个学科的初衷相违背，同时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本身的需要。这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我们确实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对其基础理论和总体框架做些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创造性结合中所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过程。展开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是一个经验性的历史展开过程，更是一个主体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理论逻辑展开过程。为此，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不仅要追踪历史去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同时也要发掘它的逻辑展开过程以探讨其体现的内在规律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就是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分析入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理论框架进行深度探索。具体来说，这种分析依次围绕历史论、概念论、发生论、矛盾论、逻辑论、内容论、机制论、成果论的逻辑递进关系展开，以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本质内涵、发生基础、内在要素、逻辑进程、内容维度、发展机制、成果形态等进行梳理，这种递进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矛盾运动关系，是这个理论创新运动自身的“客观”逻辑进程，同时也是对这个进程做哲学分析的“主观”逻辑进程。

显然，本书所进行的探索仅仅是初步的，但这种初步的探索应该不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基础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历史经验的分析，鉴于此，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论》一书专门就此展开论述，读者可以把这两本书作为姊妹篇，放在一起相互参照。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述要

大体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经过了早期译介时期的前史，五四运动时期的初步奠基，中共成立初期的初步探索，井冈山时期的初步形成，中央苏区时期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激烈较量，六届六中全会前后的理论框架形成，延安整风时期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实现，西柏坡时期的理论创新高潮，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理论飞跃等历史时期。长期的思想进程中形成了重要的发展经验、特殊的理论逻辑和丰富的创新成果。

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逻辑之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而是要通过把握一些重要历史节点，为思想逻辑分析提供一个历史线索。因此，本章所阐述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历史进程，而是抓住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对这些历史节点也不偏重于历史过程描述，而是偏重于其思想史价值分析。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史

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和译介到中国。但是，这种传入和介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只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化传播过程。尽管如此，中国人通过这些译介初步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大致情况，这就为下一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人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积累了素材。

（一）19 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传入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一些开始接触外部世界的中国思想家在介绍

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政治思想、重大政治活动的同时，零星地提到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奠定了早期基础。

中国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人物王韬（1828～1897年）在欧洲期间，经历、耳闻了巴黎公社的情况。他和张宗良合作在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纸上，最先报道了巴黎公社运动的有关情况。

江南制造局所编写的《西国近事汇编》，在逐周汇述西方各国的重要时事过程中，也经常记载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及共产党人的活动。在报道欧洲革命的时候，开始将共产主义学说引入中国的文化当中。他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把社会主义译述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贫富均材之说”；将共产主义翻译为“廓米尼士”“康米尼”。

中国早期的外交家李凤苞在其《使德日记》中，也介绍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他把共产主义翻译为“廓密尼士”，将社会民主党翻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他记述道：“‘莎舍尔德玛噶里’，各国皆有之。”

19世纪末期，中国人在翻译欧洲学者的著作过程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以及社会主义学说，他们或者是简单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或者是简单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个别内容，而这些翻译出来的文字，大都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别是有关大同社会的观念、均贫富观念等来表达。

1898年，胡颐谷将英国人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翻译成中文，以《泰西民法志》为名在上海广学会出版。书中专门有一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

1899年，李提摩太节译了英国社会学家纪德的《社会的进化》一书的部分章节，其中个别地方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连续刊登了蔡尔康根据李提摩太节译章节所写成的《大同学》一书的前4章。同年5月，广学会出版了此书的单行本，共10章内容；在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名字的同时，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他们讲求“安民新学”，也就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第8章中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书中专门有一段阐述恩格斯观点的话：

恩格思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且从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此言也，讲目下之情形，实属不刊之明论。^①

上述这些节译的内容，初步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其中不乏褒扬之词。从文化积累和知识介绍角度来说，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入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流传空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影响的早期文献。

但是，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这些被节译的著作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而是别人的作品，原著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介绍就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因此不可能提供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二，翻译者在进行文本的语言转换时，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均贫富”“安民养民”等观念来译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语言转换之时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

第三，翻译者们只是在无意中摘译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内容，而不是要主动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因此，这些资料只是提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文献，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

（二）20 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

20 世纪初，一些留日学生和维新派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态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陆续传入中国思想界，见诸中国知识分子的译文或自己的著作中。这些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早期的文化积累，为日后中国人正确理解和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前提。

戊戌变法失败后，“托古改制”的思路显然已经走不通了，搬用资

^① [英] 本杰明·纪德著，[英] 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文：《大同学》（节录），载高军、王松林、杨树标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3、34～35 页。

产阶级改良的路子也不行。此时，大量的在日留学生开始把目光转向在日本初步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大量译介日本人的社会主义著作和思想，形成了一次在国外展开的社会主义思想译介高潮。早在19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就已经在日本出现。1898年，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协会，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当时中国留学生翻译出版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有：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广长舌》《社会主义精髓》，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乌井满都夫的《社会改良论》，特地六三郎的《东亚将来大势论》，太原祥一的《社会问题》，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矢野龙溪的《新社会》，以及英国人克喀伯的《俄罗斯大风潮》，等等。这些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都有一定的介绍。这些译作增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都是直接从日本学者那里搬来，很少有自己的观点，而且他们所翻译的书中的观点并不完整准确，从而也就不可能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加之，这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译介也好，流传也好，都是在少数知识分子、留学生中进行的，对于广大的中国社会民众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充其量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小众化而不是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不可能产生。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上，特别值得提到梁启超。他是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家之一，在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多次对马克思的生平学说、社会主义思想等做过介绍，从而使中国知识界知道了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1902年10月16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三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对马克思的生平、思想地位和主要观点有简单的介绍。他写道：

麦喀士（即马克思，下同。——引者注），日耳曼人，社会主

义之泰斗也。

今之德国最有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今译为尼采。——引者注）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①

1904年2月14日，他在《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刊上，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拉萨尔的思想有所介绍：

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隳括（应为“括”。——引者注）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②

梁启超在考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从实践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矛盾，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悬殊。他还根据社会主义者的统计，得出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的结论，因而发出“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社会之一大革命，其终不免矣”的感叹。^③但是，梁启超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是均贫富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当然，梁启超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赞成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曾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指出：

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引者注），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则其流弊不可胜言。

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④

① 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1902年10月16日），《新民丛报》第18号，载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136~137页。

② 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1904年2月14日），《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刊，载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③ 梁启超：《梁启超游记：欧游心影录 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④ 梁启超：《梁启超游记：欧游心影录 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301页。

也就是说,他不仅不赞同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把社会主义看作同基督教一样的宗教迷信思想。

尽管梁启超本人并不赞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质和基本内容,但是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却是功劳的。作为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后,也在苦苦寻找新的理论、新的思想,他在介绍西方各种思想流派的时候,没有特定的选择,而是客观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一同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同时也为中国知识界进一步在这些思想中做出选择提供了早期的文献基础。特别是,梁启超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有着巨大影响,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客观上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

(三) 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

1903年2月,马君武在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第11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对马克思的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有所介绍:“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①。在文末他还列举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文中误认为是马克思著作)等著作。

孙中山在组建同盟会之后,为了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广泛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思想。其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有广泛的接触,曾在文章中自称社会主义者,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同盟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以很大的热情,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兴起了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派译介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当时,译介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

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同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德维尔德、

^① 君武(即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第2年第11号),载高军、王桂林、杨树标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书记胡斯曼会面。5月20日，比利时机关报《人民报》报道了这次会面谈话的情况。孙中山提出，中国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就是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他还指出，中国一方面要采取欧洲的生产方式，同时又要防止像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而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使中国的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三民主义理论，并把民生主义看作社会主义，这个认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信念。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进一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建立民国后，中国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要实行社会革命，即实行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1912年1月1日《民立报》以“大总统与社会党”为题，刊载了孙中山1911年12月30日同江亢虎的谈话。孙中山说他对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之”，希望对社会主义学说“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并说“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①

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演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做了阐说，对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马克思

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热之言论矣。^②

他大量解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公有理论多加借鉴，将之纳入他的土地公有、资本归公的主张当中。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中，朱执信在《民报》1905年11月第2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小传》是非

① 《大总统与社会党》（《民立报》1912年1月1日），载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② 孙中山：《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民立报》1912年10月30日），载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7页。